

归化与异化策略下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以孙致礼译《傲慢与偏见》为例

米天润

河北经贸大学 河北 石家庄 050061

【摘要】：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文化学研究的持续深入，翻译研究领域随之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范式转变，文化转向。这一转向将研究视野从单纯的语言层面拓展至译文生成的整体文化语境，政治生态、经济结构、社会环境及意识形态因素均被纳入考察范围。与此同时，译者的主体地位也在这一背景下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与正视，逐渐成为翻译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本文拟在归化与异化策略的理论框架下，以孙致礼的《傲慢与偏见》译本为个案，对译者主体性问题展开探讨。就整体翻译取向而言，孙致礼在该译本中呈现出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策略倾向。具体来看，在应对英语原文中结构繁复的长句、日常口语化的对话场景以及惯用语和谚语时，孙致礼较为频繁地借助归化手法加以处理，大量四字格成语的运用，以及“不透”等贴近汉语日常表达习惯的译法，均体现出其对译文流畅性与读者接受度的自觉追求。然而，孙致礼并未因此完全舍弃异化策略。在涉及贵族头衔（如“爵士”）的翻译处理上，以及部分为保留原文节奏感与句式对称性而保留的长句结构上，他仍有意识地保持了源语文化的异质色彩与文体风格，体现出译者在两种策略之间审慎权衡的主体判断。

【关键词】：译者主体性；归化异化；文化转向；《傲慢与偏见》

DOI:10.12417/2982-3846.26.02.007

1 引言

《傲慢与偏见》是简·奥斯汀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以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英国乡村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为底色，围绕班纳特家五个女儿的婚嫁问题铺陈叙事，借此勾勒出彼时社会的众生图景。奥斯汀惯用反讽笔法，人物对话机锋暗藏，语言在幽默与批判之间拿捏得颇为老到。小说开篇那句关于婚姻的戏谑式宣言，表面上轻描淡写，骨子里却不动声色地戳穿了当时社会将婚姻等同于经济交换的普遍心态，读来令人会心一笑，回味之余又不免生出几分感慨。

在翻译策略的抉择上，受韦努蒂等学者的影响，译者在面对文化特有项时往往倾向于走异化路线，其用意在于尽量保留原语文化固有的异质色彩，而非将一切都化入目标语的文化惯例，令读者真切感受到“他者”的存在。这一取向同时也意味着，译者不再是退隐于文字背后的透明传递者，而是在翻译目的与目标文化语境的双重照应下对文本进行有意识的“改写”，其主体性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了相当充分的体现。

2 译者主体性

长期以来，翻译的创造性与译者的主体性往往被视为误译乃至滥译的借口，这种看法实质上是一种误读，把主体性混同于随意发挥，把创造性等同于不负责任的臆造。在传统翻译观占主导的时期，译者主体性研究在整个翻译研究体系内始终处于被质疑乃至被排斥的边缘位置。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显得尤为关键：它不仅开辟了新的研究空间，更为主体性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托，使这一议题在学术层面逐渐获得了应有的“合法性”。（查明建、田雨，2003，p21）与此同时，古今中外对译者形象的种种比喻也颇耐人寻味，从

“舌人”“译匠”到“带着镣铐的舞者”“文化搬运工”，这些说法各有侧重，折射出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语境下人们对翻译活动之性质与难度的理解，也隐含着对译者角色与价值的不同判断。（查明建、田雨，2003，p20）

3 归化和异化策略

1995年，韦努蒂在《译者的隐形》中系统阐述了“异化”与“归化”这两种翻译策略：前者倾向于保留源语的文化个性，后者则以译入语的文化规范为依归。就两者的实际效果而言，异化策略有助于目的语读者接触和了解异质文化，归化策略则更注重译文在目标语语境中的可读性与接受度。当然，二者在翻译实践中并非非此即彼，往往是相互交织、灵活配合的。

具体来说，异化强调在译文中尽可能留存源语的文化色彩、语言结构乃至思维逻辑，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感受到一种异域的陌生感；归化则反其道而行之，以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文化期待为出发点，将原文内容转化为更为流畅自然的表达，降低理解门槛。两种策略各有其理论依据与适用场景，如何取舍与调配，往往取决于译者对翻译目的及读者需求的判断。

4 《傲慢与偏见》孙致礼译本

英国作家简·奥斯汀是女性平权的启蒙者与先行者，对应社会革命中的英国式温良，其小说《傲慢与偏见》以“优雅—适度”的女性形象展现出对两性平等的基本态度与具体诉求。这部作品在谋取性别解放中常常迷失于虚妄的性别对抗或男女同质化的悖反现象。现代社会中的女性解放与自由之路坎坷，唯赖“不欲—勿施”式的换位思考与深度尊重，以及公平正义的

法制规范与才情差异的性别共识，三者综合施治方有和谐之效。（傅守祥,杨洋,2020,p97）

孙致礼先生翻译过奥斯丁的六部作品，艾米丽·勃朗特的《呼啸山庄》和哈代的《苔丝》，并且译文的语言准确而生动。从翻译材料的选取上我们可以看出孙致礼先生某种程度上倾向于选择有着大量心理描写和人物对话的文学类文本，这一程度上体现了其译者风格。（兰越，2019，p.38）

5 孙致礼译本中的“归化”与“异化”实例分析

5.1 社交称谓与语体风格的归化处理

孙致礼在处理18世纪英国上流社会复杂的称谓体系与礼仪化语言时，整体上采取了一种兼顾准确性与可读性的策略，在异化与归化之间保持相对平衡。以已婚女性称谓为例，“Mrs.Bennet”“Mrs.Gardiner”分别被译为“贝内特太太”“加德纳太太”。“太太”作为现代汉语中较为常见的称呼方式，能够体现人物已婚身份。同时，译者保留了人物姓氏，使人物关系与身份信息得以清晰呈现。不过，在涉及英国贵族头衔时，孙致礼又适当保留了原作中的阶层色彩。例如，“Sir William Lucas”被译为“威廉·卢卡斯爵士”，“爵士”这一称谓明显带有异化色彩，它不仅保留了英国社会特有的等级制度，也使读者能够感受到人物所处的社会身份。例如，“Her figure was elegant, and she walked well”被译为“她体态袅娜，步履轻盈”。这一译法不仅保留了原句并列结构的对称感，还通过四字格增强了语言节奏，使译文在形式和意义上都较好地呼应了原作风格。因此可以看出，孙致礼在翻译《傲慢与偏见》时，并非单纯追求字面对应，而是在忠实原文与汉语审美之间进行了较为成熟的协调（杜庭禧，2025：179）。

奥斯丁的语体特色是优雅的叙事、微妙的反语和讽刺，以及18世纪英国上层社会冗长、委婉的社交语。孙致礼译本的主要目标是再现其幽默与优雅，同时消除语言障碍。“My dear Mr.Bennet,” said his lady to him one day.孙致礼先生译：“亲爱的贝内特先生，”一天，贝内特太太对丈夫说道。“my dear”在18—19世纪日常婚姻对话中很常见，并不一定带强烈情感。如果直译成：“我亲爱的贝内特先生”会显得中文非常“欧化”。孙致礼删去“my”并调整语序，使其符合现代汉语习惯，同时保留一种略带客套、絮叨的夫妻语气。

5.2 人物对话的口语化与性格适配

贝内特太太“Have you heard that Netherfield Park is let at last?”译为：“你有没有听说内瑟菲尔德庄园终于租出去啦？”“终于”显示出贝内特太太的急切，“租出去啦”口语自然，贴合其咋咋呼呼的性格。贝内特先生对妻子说：“You want to tell me, and I have no objection to hearing it.”译：“既然你想告诉我，我听听也不妨。”“不妨”带轻讽刺，还原其幽默与克制。

伊丽莎白调侃达西。原文：“I could easily forgive his pride, if

he had not mortified mine.”孙致礼译文：“假使他没有伤害我的自尊，我会很容易原谅他的骄傲。”这一句非常体现伊丽莎白式的“俏皮锋利”。

原文“How good it was in you, my dear Mr.Bennet! But I knew I should persuade you at last.”孙致礼译文“亲爱的贝内特先生，你真是太好啦！不过我早就知道，我终究会说服你的。”“你真是太好啦”是典型的汉语口语夸赞句式，比直译“你是多么好”更符合一个喋喋不休的母亲的说法方式，性格适配度高。

5.3 句式转换与语体平衡

例如:Mr.Bingley had not been of age two years, when he was tempted by an accidental recommendation to look at Netherfield House.孙译：“当时宾利先生成年还不满两年，因为偶然听人推荐，便情不自禁地要来看看内瑟菲尔德家宅。”原文的时间状语从句前置、被动结构(was tempted)转为主动(“情不自禁”)，“情不自禁”是汉语中极生动的口语化表达，将英文“tempted”的心理被动感转化为人物主动的内心活动，语体上更贴近小说叙事的亲切感。

例：She was shown into the breakfast-room.孙译：“她被领进了早餐室，”英语被动句在汉译中直译为了“她被领进……”。孙译选择了保留“被”字句。这在汉语中并非唯一选择，但在此处是合理的，因为“被”字句在汉语里能清晰传达人物的被动处境，而这一处境在原著语境中往往有人物地位或社交关系的隐含信息。

例：What a fine thing for our girls!孙译：“真是女儿们的好福气！”原文感叹句语气热烈，带有贝内特太太特有的夸张性格。孙译以“好福气”与“真是”强化语气，在句式上保留感叹句，通过词汇手段加强了原文的感情强度，实现语体平衡。

5.4 习语和谚语的意译

意译的关键在于传达原语习语的内涵和功能，而非其字面形式。如“I am not afraid of you.”他译为“我才不怕你呢。”“not”是英语强调否定的习惯表达，字面是“连最少一点都没有”。孙译用“才不怕”这一汉语口语惯用强调式对应，既保留了语气的斩截，又完全融入汉语口语节奏，不留翻译腔。这种简约而不失准确的译法，不仅在形式上契合了汉语的表达习惯，更在人物塑造层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通过凝练有力的措辞再现了凯瑟琳夫人惯于发号施令、言简意赅的话语风格，并在字里行间勾勒出其精于算计、处事老练的人物形象。（张蕴瑶&王志勤,2023，p.3）孙致礼先生对习语和谚语的这种意译处理，充分体现了其译者主体性中以目的语读者为中心的倾向，即强烈的归化意识：1.追求流畅和地道：译者避免了生硬的字面直译，而是采用读者熟悉的四字格成语、熟语或自然口语表达，使译文摆脱了“翻译腔”。2.文化内涵的转换：译者成功地将英国文化语境中的习语内涵，转换成具有相似语用功能的中国文化表

达,实现了深层次的文化沟通。

6 结论

总的来说,孙致礼先生的译文深受读者的喜爱,其翻译力求接近简·奥斯汀的文本,生动的展现了不同人物的性格特点,同时又避免了“翻译腔”。孙致礼先生的《傲慢与偏见》译本,在归化异化理论的框架下,无疑是一部采取主导性归化策略的

成功译作。译者以娴熟的汉语功底和深厚的文学素养,积极发挥了其译者主体性,通过意译、句法调整等手段,为中国读者奉献了一个流畅、优雅且极具可读性的经典译本。尽管其高归化倾向可能导致部分文化细节的“隐形化”,但其对文学经典普及和读者阅读体验提升的贡献,使其在中国外国文学翻译史上占据了不可动摇的地位,并为后来的经典重译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参考文献:

- [1] 查明建,田雨.(2003).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中国翻译,(01),21-26.
- [2] 杜庭禧.(2025).归化与异化技巧在《傲慢与偏见》文本翻译中的体现.名作欣赏,(30),179-181.
- [3] 傅守祥,杨洋.(2020).现代女性意识的文学发动与两种革命——以《傲慢与偏见》《简·爱》为例的审视与反思.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06),97-104.
- [4] 黄燕平.(2017).接受美学视角下的异化与归化策略——以《傲慢与偏见》为例.名作欣赏,(14),154-155.
- [5] 兰越.(2019).语篇翻译视角下孙致礼翻译风格研究.文学教育(下),(08),38-39.
- [6] 万丽.(2016).浅谈《傲慢与偏见》译本翻译的杂合现象——以孙致礼译本为例.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9(18),164-165.
- [7] 张蕴瑶,王志勤.(2023).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傲慢与偏见》汉译本对比分析——以王科一、孙致礼译本为例.英语广场,(32),3-6.